

朱德在生死关头的智勇谋略

朱德有“红军之父”之称号。在险象环生的危难时刻，朱德之所以能逢凶化吉、遇险呈祥，并非靠什么运气和天意，而是靠他的大智大勇和干部战士们的奋力保护。

朱德总司令频频遇险的故事，为他那波澜壮阔的光辉一生增添了绚丽的色彩。

朱德大喊抓朱德

1928年11月，彭德怀、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来到井冈山，与红四军会合。看到共产党力量日益壮大，蒋介石如坐针毡，纠集6个旅3万人的兵力，兵分五路，“围剿”井冈山。

面对敌人进攻的严峻形势，红军领导人经过商量作出决定：红四军大部出击赣南，红五军和红四军的三十二团留原地，移动目标，转至敌人侧后，使敌人穷于应付，不能实现两省会剿红军的计划。

2月1日傍晚，部队来到了四面环山的寻鄔县圳下，朱德观察了周围环境，发现圳下有个大村庄，便下令部队宿营。一路尾随的国民党赣军独立第七师发现红四军在圳下时，也累得不想打了。于是，他们便在离圳下

不到五里路的几个小村庄安营扎寨，准备第二天再战。

次日清晨，天灰蒙蒙的。次日清晨，独立第七师乘虚而入，将文昌祠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敌人冲进朱德的屋子时，一个高个子士兵端着枪，对着朱德说：“你们朱军长呢？谁是朱德？”朱德的妻子伍若兰灵机一动，她指指朱德说：“他是伙夫，你们要找的朱德在前面一幢房子。”敌人上下打量了朱德，见他黑黑的四方脸上满腮的胡须，穿着一身破旧的军衣，确实不像个当军长的，于是朝伍若兰指的方向走了。

伍若兰见敌人一走，催促着朱德说：“你快走，我掩护你！”说罢，将朱德直往外推。朱德深情地看了妻子一眼，混入敌群中出了村。

朱德见自己人多数向南撤退，灵机一动，大喊道：“朱德向北跑啦，快向北追朱德，一定要抓住朱德啊！”他通过这种方式暗示自己人，赶快向南突围。果然，不少敌人中计，纷纷向北追去。

但伍若兰却被敌人俘虏，几天后被杀害，年仅26岁。这成了朱德心中永远的伤痛。

另类军统邓葆光：献宝引来 40 载沉浮

邓葆光，湖北黄安（今红安县）人。1950年将7万册珍贵图书秘密运回内地，此后定居上海。1955年受所谓“潘扬事件”牵连，被判刑入狱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。

1935年，邓葆光与美籍妻子格尼娜一同就读于东京日本中央大学，这一时期，他在上海、南京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 不少经济论文，引起经济学界人士的注目。

一位自称姓胡的中国驻日使馆官员联系上了邓葆光。由于志趣相投，邓葆光视胡某为知音。胡某鼓励邓必须为祖国继续研究日本经济，为国家贡献才智。邓葆光回国发展之机，胡给邓葆光写了一封推荐信，将他荐引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军统局工作。由于大学专攻经济，工作得心应手，邓葆光很快受到重用，奉戴笠之命，到上海接收日伪经营的东方经济研究所的全体人员和财产。

好景不长，戴笠机毁人亡的消息引起了军统的大地震，使得邓葆光这类军统局高级头目而又资历较浅、背景不深的人，不断受到排斥。

此时，邓葆光在清理时发现大量

敌伪所藏的图书资料中，有大量大汉奸周佛海、梁鸿志、赵尊岳等所藏的珍贵善本图书，其中不少是仅有的孤本。邓葆光将其登记造册，并报告军统局本部。

之后不久，国共破裂，内战打响。在台的军统局严令邓葆光将他所掌管的财产尽快抢运到台湾。邓葆光接受任务后，给军统局打报告，称“上海飘摇，暂避香港”，获军统局同意。于是，邓葆光找朋友汤元秉商量，汤元秉以仅存的棉纱抵押了70两黄金，资助邓葆光将古籍运到香港招商局仓库。

此时，隐藏在东方经济研究所的一名陈姓中共地下党员找上门来。在他的引荐之下，邓葆光与潘汉年见了面。潘汉年对邓葆光保护国宝的义举予以了高度赞扬，在潘汉年的帮助下，邓葆光全家和几位心腹一同迁往香港。

1949年6月，邓葆光化名邓景行，在香港开了家宝丰洋行，平日里深居简出。邓葆光心里一直挂着藏在香港招商局仓库的图书，认为那并不是个十分安全的地方。于是，他私

与敌同行过敌区

1948年5月12日，朱德和陈毅、粟裕分乘三辆汽车从城南庄南下。傍晚，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此时接到地方同志的报告：“东南方向30里处有国民党的散兵行动。公路两旁还有敌人的碉堡。”

接近敌人占领区时，粟裕和陈毅的车先行停下，他俩走到路边的土岗上观察敌情，发现前方有200多人，沿公路向东南方向步行，便向后面的朱德报告，请示是不是暂时停一停，避开这股敌人。

朱德正在思考，后面的警卫员跑来报告说：“总司令，后面发现敌情，多少人不知道。只看到几辆车的车灯闪着，是朝我们开来的。要不要避一避？”朱德沉思了数分钟，然后果断地决定：“继续前进！”

“什么？继续前进？”众口同声问。“对！”朱德肯定地回答：“我们要处变不惊，今晚我们要趁着月黑天暗之际来个浑水摸鱼。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不必理睬前后两路敌人，只管向前开，大家作好战斗准备，按我的命令行动！”

（据《党史文汇》）

大家虽然有些担心，但对朱德这个出奇制胜的决定十分佩服。一行人上了车，大摇大摆地向敌人开去。

在车子开到面前时，敌人纷纷闪到路边，让出一条道。不仅如此，路边的敌人突然奔跑起来，然后听到“集合”、“立正”、“向右看齐”、“向前看”的口令声。随着口令声，原来三三两两的敌人排起了整齐的队伍，列在路边，朝着开来的三辆车行注目礼。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原来，朱德一行所乘的三辆车都是刚刚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。敌人看见只有三辆车，而且两辆是吉普车，大摇大摆地从他们面前开过，做梦也不会想到车上坐着的是解放军的总司令，还以为是我们的上司到了，所以仓促整队欢迎。

隐隐约约，他们听到后面敌人的汽车的喇叭声响，估计离他们只有200米。朱德沉着地指挥驾驶员，在两边有国民党步兵的“夹道欢迎”，后面有国民党汽车队的“护送”下，顺利地通过了敌占区，驾车直奔华东野战军整训驻地濮阳去了。

（据《党史文汇》）

下搜寻到一处不显山不露水的私人小仓库——中环路的永安仓库存放。此时身在台湾的毛人凤，突然想到了邓葆光，想到了那批国宝级的孤本与善本图书。他指示在香港的“军统”：一、继续追查图书下落；二、侦知邓葆光住处，见人即处决！

1950年9月12日邓葆光在街头身中九刀，倒在香港红棉酒家门前。在妻子的悉心照顾下，邓葆光从死神手中逃脱。当“军统”特务得知邓葆光经过三个昼夜的抢救保住生命的消息后，又试图害死邓于病床上。无奈格尼娜朋友多，住的又是洋人开设的医院，特务们无法得手，于是将邓葆光所在医院包围起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格尼娜不得不与港督警察署交涉：为保障被害人邓葆光的生命安全，必须离开香港去内地就医。

此后来，格尼娜施巧计，让港英当局用“灵车”将邓葆光护送至罗湖桥的北头，邓葆光自此安全地进入广东。其后，邓葆光迁居上海，可他仍日夜系念着他给新中国的礼物7万册珍贵图书及其他资料的安全。

一天，上海副市长潘汉年、公安

局长扬帆一道来探视邓葆光，并带来令邓葆光特别兴奋的消息：那批深藏在香港仓库的国宝，已全部安全运抵上海，不久将送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，保存于故宫博物院及北京图书馆。

1955年，正当邓葆光准备进一步做好经济研究时，横祸飞来：曾与他有直接联系，引导他正式回到人民行列的潘汉年、扬帆被定为“内奸”。既然潘、扬被定性为“内奸”，那么，由内奸“掌握”的“军统”还会是好人吗？

不久，住在带花园洋房里的邓葆光被审查。捕邓的单位，给邓下了个含糊其词的“定论”：“自首不诚”。既然自首不诚，自然构不成“重大罪刑”，量刑时给了个“有期徒刑5年”。此后，邓葆光一直在徐州一座煤矿里，默默无闻地扛着大扫帚，日复一日地扫着大街。他的妻子格尼娜也毫无理由地被关押了14个月。只不过邓葆光的刑期似乎太长了，竟长达25年（刑期拖至1980年）之久。与之生死与共的妻子被迫与邓葆光离婚，回到美国。

（据《民主人士》，《文史春秋》）

周恩来的传奇谍战岁月

■ 凌云

干什么的。有一次，儿子偶然发现枕头底下有一把手枪，就问李克农是怎么回事，李克农说：“爸爸干的是公家的事，你不要问。”

而胡底被调往天津，顺利掌控了北方机关的情报；钱壮飞则当上了总务调查科科长、“中统”领导徐恩曾的机要秘书。

上海滩帮会大佬杜月笙的顾问杨度曾被中央特科“拉出来”。

杨度早年便是慷慨儿郎，接受康有为、梁启超的维新思想，还与袁世凯私交颇深，袁世凯称其“精通宪法，才堪大用”。后来，杨度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，世界观开始改变。

1929年，潘汉年打算介绍杨度加入共产党。周恩来考虑到杨度的知名度很高，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氛围，这样一个与各界都有广泛联系的消息灵通人士，能发挥很大作用，于是批准了54岁的杨度成为中共秘密党员。

“杨度还出庭为被捕的恽代英辩护。恽代英很硬气，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恽代英，而是坚称自己的化名，国民党也被弄糊涂了。可惜，就在恽代英快要被提前释放时，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被捕了，生活日渐腐化的他当晚就叛变了，还把恽代英出卖了，恽代英没过几天就被蒋介石的刽子手处决。”

果敢决绝

“顾顺章认识全部特科人员，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，只要他开口，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一网打尽！不过，顾顺章说要见到蒋介石才能提供全部情报。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急着邀功请赏，先向党务调查科报告了顾顺章已叛变的消息。”

一夜之间，武汉向南京连发6封紧急电报。“当时正好是周末，徐恩曾跑到上海玩儿去了，武汉发的电报全部落入钱壮飞手中。钱壮飞立刻让女婿刘杞夫到上海向李克农报告。李克农顾不得安置家属，就向上级汇报。”在周恩来身边长大的侄女周秉德说。

“当时情况非常危急，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，采取妥善措施。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，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，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，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。两三天里，我们紧张极了……”当年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曾回忆说。

4月28日，陈立夫、徐恩曾派张冲等人赶到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，却一无所获。

陈立夫问旁边的特务：“刚才见

到什么人？”对方答道：“进入弄堂时与一个气质庄重的女子和一个行色匆匆的老头擦肩而过。”

顾顺章后来得知此信息时说：“那女子是周恩来，那老头是陈赓。”

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时，16岁的俊朗少年周恩来就在校话剧团中扮演过女角。陈立夫哀叹：“抓住周恩来，只差5分钟。”

闲棋冷子

熊向晖是周恩来早年布置在胡宗南身边的一枚“闲棋冷子”。

他在清华大学时秘密加入共产党，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庭长。1937年底，周恩来在武汉给进步学生演讲，熊向晖被深深折服。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蒋南翔把熊向晖推荐给董必武和周恩来。

周恩来在充分了解熊的情况后，安排其接受胡宗南面试，进而凭其才能成为胡宗南的秘书。董必武嘱咐他“少联系共产党、一定做好隐蔽工作”。

1942年，蒋经国巡视西北3个月，熊向晖奉命陪同，两人交情渐深。熊向晖的机会更多了。1943年7月3日，正是他将胡宗南的进攻计划传到延安，“闲棋冷子”始见奇效。

而胡宗南和蒋经国对他信任如故，1947年他结婚时，证婚人正是蒋经国。蒋经国还答应支付婚礼所需费用，并让熊向晖把所邀宾客的姓名和住址告诉他的秘书陈元，由陈元代为印发请柬。陈元原是胡宗南部下，恰是熊向晖将其介绍给蒋经国的，自然也乐意帮忙。

“胡宗南还打算让熊向晖赴美留学，熊向晖秘密向周恩来报告。周恩来说：‘去！国民党花钱为我们培养人才，为什么不去？！’”

后来，由于机要不好买，胡宗南又让熊向晖在他身边工作了3个月。其间，胡宗南对熊向晖说：“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，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。并选在3月10日发起攻击。”说完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，里面是进攻延安的方案和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。

熊向晖将文件内容默记于心。3月3日晚，他就将情报送到了西安《新秦日报》主编王石坚的家，通过电话将情报发到延安。此时，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都对此计划一无所知。

由于有可靠情报，共产党总能在胡宗南眼皮底下行进，胡宗南非但没能“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”，自己反而损失惨重。



周恩来

他下的子都能收回来

1941年9月，中央情报部成立。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及长江局副书记、南方局书记，继续部署、领导了党的情报工作。他具体地、创造性地提出了“三勤”（勤学、勤业、勤交友）与“三化”（职业化、社会化、合法化）政策，核心是职业化。

他要求每个秘密工作人员都要以固定职业作掩护，一切言论、行动、服饰都要同本身的职业地位相称，“党的工作要打入社会，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”，三教九流都可参加，但必须同流而不合污，而且必须具备并利用过硬的专业技术。

沈安娜就是一例。

她凭借出色的速记技能，考入浙江省国民政府，后来进入国民党中央，蒋介石的重要会议她都参与记录。

1938年冬，沈安娜看到国民党无望，提出去延安的要求。周恩来对她说：“你已经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，能参加各种重要会议，接触机密文件。为了情报，要甘当无名英雄！”

蒋介石在国民党高层决策会议上，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，会突然示意：“下面的话不要记。”这时，全场的人员都要停下笔来。沈安娜就把蒋介石的讲话牢牢牢记在心里。待到会议休息上厕所之际，再偷偷写下来。

1949年4月，沈安娜离开国民党，回到上海。5月，上海解放，沈安娜的情报生涯结束。“放出去的网，伯伯最后都收回来了，真是深谋远虑，收放自如。”周秉德说。

张治中曾感慨：“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、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，今天才知道，在情报工作上，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。”

国民党撤退台湾后，周恩来仍然领导着两岸之间的情报工作。

隐蔽战线从无到有，从弱小到壮大，周恩来是无可争议的奠基者和领导者。

（据《环球人物》）